

创作谈

我爱这热气腾腾的生活

□赵冬苓

自《警察荣誉》开播以来,不时有网友在网上追问:这部剧是不是剧版《守护解放西》?是不是中国版(Live)?我要回答:都有道理,但也都不是。

写《警察荣誉》最早的灵感来自一部在中国比较小众的美剧《南城警事》。大概五六年前我看到这部美剧,很喜欢,跃跃欲试地想也许我也可以做类似的剧。后来看了韩剧(Live),我更坚定地想要试试。当我们开始了《警察荣誉》的创作后,我看了《守护解放西》的第一部,观众的热烈反响坚定了我创作这部剧的信心。

但这部剧更多的灵感来自我对警察这一职业的了解。我曾经多次写警察,那时我写得更多的是扫黑除恶大案的警察,在那些创作过程中,使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基层派出所民警,他们就像我们剧中的赵继伟一样,默默干了许多事,做了许多努力,但总是不被大家看见。但对于警察这个职业来说,他们最大量的日常,不就是基层派出所琐碎的、纷乱的、化解矛盾、保一方平安的工作吗?我们这个社会能平安运行,一方百姓能安居乐业,靠的不就是这些默默无闻工作在第一线的“警察小透明”吗?创作一部反映基层派出所普通警察工作生活的影视剧的想法就在那个时候明晰起来。所以,如果说《警察荣誉》有个出身或来源的话,那就是我们身边这热气腾腾的生活。

创作的主旨从那时候就明确了:我们不去写警察破大案除大恶,我们就写警察每天处理这些鸡毛蒜皮,和身边这些有着种种人性弱点的老百姓打交道;不写警察身上的大智大勇,而是写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写年轻人在这其中的成长,写年长者在生活的疲惫中如何对待这份职业,以及在庸常的生活中表

现出警察的使命和荣誉。

为了写好这部作品,我带着我工作室的几个年轻人采访了济南5个派出所和1个刑警队,采访了几十位工作在第一线的警察,听他们讲述了他们工作中的酸甜苦辣。我们几个年轻人还跟着警察值了几个大夜班,跟随警察们一起处理各种警情,亲身品尝了警察们工作中的快乐和苦恼。现在,写入《警察荣誉》的案件大小小有几十件,我可以骄傲地说,尽管有艺术再创作,但几乎每一件都是我们从生活中“捡”来的,有些几乎就是原封不动照抄的。我一直记得那天坐在济南十六里河派出所,听所里一位老警察笑着和我们讲起来因为让报案人留血样而引起冲突,所长被迫带着几位警察去当面道歉的故事,甚至包括去之前的心理建设,互相鼓励说一定要坐够40分钟。他笑着说,我们笑着听,听着听着,一丝感动在心底油然而生。这就是引起网上热烈讨论的夏洁去给吴大夫道歉案。我们还在济南龙洞派出所见到了一位“破案狂魔”,一位快50岁的辅警。一把岁数了一个月才挣两千块钱,住集体宿舍,却一心一意抓小偷、破了大大小小无数案件。在路上走过,看到一个人的身上有奇怪的伤口便会引起他的警惕,他顺手破获了一个专门盗窃工地物件的犯罪团伙。还有李大为刚入警碰到事就喊拘了吧拘了吧,通过采访才知道拘一个人多不容易,警察是多不愿意采取这种手段:办拘留有一整套手续,办下来得花费一整天,在警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有这一天的时间可以做好多事情。另外,嫌疑人有任何情况,比如有病,拘留所就不会收。

警力不足、大量无效警情以及信访压力,是基层干警反映强烈的几大问题,我们在采访中对这深有体会,所以在剧本里也有充分的表达



和体现。由此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干这样一份工作,收入不比其他行业高多少,工作量却要大得多,每天应对大量鸡毛蒜皮,那么,基层派出所普通干警,他们工作的动力来自哪里?在本剧中我们给出了自己的回答,那就是该剧的题目:警察荣誉。在我们看来,这世上有某些职业天生是和使命、荣誉这样一些大词联系在一起的,警察这种职业就是。对于基层派出所干警来说,他们的荣誉感不是破大案、除大恶,而是通过自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维持一方安宁,保一方平安,让人民群众的平安指数和幸福指数都有所提高。所以我们给本剧取的名字就叫《警察荣誉》。

我每天也和观众一起追自己写的剧,上一次这样的体验还是我写的《沂蒙》。我看到随着剧情的推进,几乎每天都会引起观众激烈的争论:对那些不讲理的民众,警察不是在和稀泥?为什么法律拿那些地痞无赖没有办法?明明警察没有错,为什么还要去道歉?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想说明一下:

我们设计的八里河派出所位于城乡接合部,辖区里有大量从农村转化来的城市居民。在我看来,这种居民成分的构成是有某种隐喻意义的,并不是说农村居民的素质就比较差,而是过去的农村生活和现在的城市生活代表了两种生活方式,一个是熟人社会,一个是陌生人社会,这两种社会处理问题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比

如孙大爷遛狗不牵绳引发的案件中,为什么孙大爷一家遇到事有那么多人帮忙?因为他们过去是一个村的,而过去的熟人社会处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帮亲不帮理。剧中一开头所长王守有一段台词,大意是说我在这工作了30多年,我眼看着乡亲们进了城,成了城市居民。他们还不懂得城市生活的规则,但我们懂,我们要教会他们学会遵守城市的规则。这段台词,可以说是本剧中警察在处理许多问题时遵从的原则。在社会生活中,警察可以说处在处理社会矛盾的第一线,他们碰到的许多问题有些是可以用法律处理的,更多情况是法律也无从下手,处于情与法的模糊地带。在这种时候,警察处理问题的原则是尽可能化解矛盾,尽可能还市民生活的安宁。

那么,是不是在情与法界限模糊的地方方法就应该让步呢?这个分寸,要就事论事,考验的是执法者的执法水平和人情世故。但有一个考量观众应该是同意的:处理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的,做事不能不讲成本,特别是需要消耗民众的成本时,需要更加谨慎。还是拿孙大爷案来举例:孙大爷一家无理取闹,使小夫妻生不如死,警察可不可以装上监控等拿到证据来法办他们?可以。但法办的力度有限,人数众多,每个人的违法不足以用法律手段打击,同时存在取证困难、取证时间长等问题,而成本呢?则需要以牺牲小夫妻的生活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老警

察会更倾向于劝小夫妻委曲求全和解,尽快恢复平静生活。至于孙家子女涉黑的问题,大家可以猜到,警察并没有放弃努力。

我经常想,中国将有一段相当长时间从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这种情理法的模糊地带是始终大量存在的。在处理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一味追求正义的实现,还要考虑社会的总体安定和成本的付出,我们可能经常不得不做出妥协和牺牲,而社会就是在这种反复拉扯中缓慢进步的。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和为贵,现代讲要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和谐中,就包含了沟通、妥协、各让一步,以及尽可能把矛盾化解于最小的种种生存智慧。如果我们只看到妥协和忍让,看不到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艰难进步,那是一叶障目。但如果我们只希望看到正义的实现而不希望其中存在着任何的妥协和牺牲,那也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任何进步都是艰难的,王守一们在这其中做着身体力行的探索,无论分寸把握得怎样,都值得我们尊敬。

我一直有个观点:现实题材不等于现实主义。在我看来,何谓现实主义?勇敢地面对真实,不伪饰、不回避、不矮化、不溢美,提出真问题,引出真思考。我自豪地认为,《警察荣誉》在某种意义上做到了。我将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为了我们的明天更美好。

(作者系《警察荣誉》编剧)

评点

从电视剧《风起陇西》看我们如何讲述后“三国”的故事

□苏妮娜

记》等正统叙事中,两国交战,“刺客”就是专门执行刺杀任务的间谍,其在历史评价中是“侠”,刺杀、反间在各类书写中常被视为义举,《史记·刺客列传》便是一部慷慨悲歌的英雄谱。电影《英雄》沿用的正是这种观念。“侠”,后来甚至与“士”并列,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士是内化了的侠。可见这种类型的联合或者说融合本就有据可依。

导演路阳一直以武侠片为专长。他异常地坚决于自己熟悉的地带,在《绣春刀》系列之后,驾轻就熟地操刀了有二次元色彩的电影《刺杀小说家》,沿用的仍是武侠或是动作电影的根底。他捍卫的不仅仅是题材的边界,更是电影语言上的简劲、质朴、有效,从而确立起一种动作戏的实感和题材的严肃性。这一次,他把电影视觉语言应用于网剧拍摄,加之光影感严苛的优越审美——没有滥溢的色彩分毫,没有情绪上的撩拨,没有浪费的情节——以正史的格调与氛围完成这个传奇故事,从初心上就胜出了若干前辈。

职场拼搏与谍战反间戏码常常捉对出现,《潜伏》《叛逆者》,以至于更早的《无间道》中都常见。反间计中最重头的是戏码的不断反转,而支撑起反间戏的是人物的内在行为逻辑,既要经得起当下情境中人的信任测试(间谍在敌方阵营中的潜伏角色能骗过所有人,甚至深受敌方高层信任),又要在反转回己方阵营时仍有饱满的信念感。剧情反转似乎不难,在任何情境下都能应付裕如,对于主角身上坚定信念感的表达才是这类剧最难的地方。在《风起陇西》中,荀诩从头到尾一根筋,没有人怀疑他的本质是黑是红。陈恭便不一样,他的任务完成得太出色,情节的完成度使人辨不出他的底色,他的内在构成太复杂,不仅骗得了别人,更像是骗过了自己。以至于陈恭结尾的选择也让观众一度怀疑其陷入身份/自我角色的混乱,就像《无间道》中的刘健明。表面看来,陈恭与冯膺一样,以玩转一切的个人才智与心态,撑起这部冷兵器时代的谍战大戏。一直反转到最后观众才明白他内心已出离“谍”的工具性,回归“游侠”的自由意志。

《风起陇西》的落脚点仍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大与小不成比例的对峙,在原著马伯庸的创作中也是常用的一种模式,它突出主要人物身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腔孤勇。路阳对这个内核既有吸纳又有转化,《风起陇西》的内核与《绣春刀》一、二和《刺杀小说家》形成接续,而且渐次清晰:专注于小人物在官僚机制、权力斗争等庞然大物面前如何保有自身,不被吞噬。《风起陇西》中的游梁与《绣春刀》中的厂卫一样,如果不想卑微如尘土被一指

掸去,那就要不计代价、奋力一搏。

这里有一个从历史叙事到谍战叙事情节模式上的转化。曾经有研究者指出,我国影视剧剧中常见一种家国模式。家国模式可以分为若干种,比较常见的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家·春·秋》这类战乱、革命背景下的家国同构模式。但是家国同构模式在谍战剧中不得不面临考验。陈恭的小家庭一度破碎,对他来说,去完成一个惊人的任务不难,但是保有常人的温情幸福却很难。司闻曹交给自己的任务,几次都使得至亲之人牺牲、被误杀,甚至上峰寒性冷血地要求他干掉视为至亲的荀诩,由此,亲情与私情受到匡扶汉室等大义的毁灭性打击,引以自傲的职业信仰与职业身份已经摇摇欲坠。家国同构模式让位于个体同权力集团对峙模式,这里十分接近《谍影重重》《无间道》,而远离了《三国演义》,远离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正统伦理,而把一个游走江湖只求在夹缝中求生的乱世小人物推到银幕前方。

陈恭、荀诩、翟悦走上游梁这条道路是该剧前半截家国同构叙事发挥有效情感驱动作用的产物,到后半段,翟悦之死、冯膺等人各种谎言和行径,陈恭的情感与信仰备受打击,故事转而走向前述个体同权力集团的对峙模式。也就是剧中,诸葛亮斥责杨仪的党争没有底线、不择手段之处。从创作角度来看,多类型杂糅,因其多重叙事的内部发生机制不统一,以及间杂故事模式的变化,陷入了叙事动力不足的弊端,或者说叙事动机的一再改弦更张导致后继乏力。从结果看,该剧在围绕陈恭与冯膺的身份几次反转过后,剧情很难再以饱满的叙事张力带观众去领受陈恭之死带来的震撼和心碎,而是相反,观众还没有摸清头脑,陈恭就上了断头台。以至于结尾时人们还在期待,陈恭死后还有终极反转。这个期待与其说是对于人物美好结局或者续集的痴心妄想,倒不如说是观众其实并未被真正说服,个体被权谋所碾轧的悲剧感没有如期而至,使得观众本该抵达的悲壮慷慨的情感强度大打折扣,这是该剧结尾令人生憾之处。

电视剧《风起陇西》如同之前的《长安十二时辰》,在尊重观众审美与智商的前提下,按照对待正剧的姿态,以电影拍摄的优质影像语言,以及与当代观众相通的情感模式重新讲述了一个老故事。只不过,不论人物是跟随内心真实想法远遁山林,或是自戕以结束游戏,或是甘当棋子继续职场争斗都不算是对困境的真正解决,在一个大众叙事语境中,如渲染“游侠”所散开的精神自由度与自我的超越,则难免带剧情从“史”走向了“神话”。

(作者系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副编审)

小说《六尺之孤》探索影文互动新思路

5月22日,由王霄夫创作的《六尺之孤》作品专题研讨会在浙江杭州举办。会议由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范志忠教授主持。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院长夏烈、浙江传媒学院影视艺术学院副院长卢炜、浙江省影视审查专家库成员徐洲赤、浙江摄影出版社社长郑重、浙江大学影视艺术与新媒体学系主任林玮、中国美术学院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教授常虹等省内专家参加了本次线下研讨会。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系研究中心主任陈旭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奇佳、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中心主任周安华、《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高小立、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主编刘冰雅等外专家以线上方式参会。会上,专家学者围绕小说的影视开发、时代背景、故事细节、语言风格、主题思想等进行研讨,并提出了影视化改编的专业意见。

饶曙光表示,该小说是一部极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对历史有了一个全新表达,而这种魔幻现实主义取自现实经验,又在历史的呈现中避免了悬浮感。“罗生门”式的另类叙事设计,拓展了读者的阅读经验,使读者对历史有了更深的认识。郑重认为,作品中孤胆英雄式的设计,悬疑式的故事铺陈、奇幻式的古老文化、高度聚集的场景、丰富的自然景象和地域人文记录,使《六尺之孤》作为一本优秀的小说的同时,也拥有了成熟影视IP母本的品质与要素。陈旭光谈到,小说具有一种南方特有的湿润韵味,犹如一幅“南方近代风俗画”,并提出了“江南美学”的观点,其江南地区的地方史、家族史乃至国民革命史达成隐喻与互文,可以称其为“南方版的《白鹿原》”。同时,小说主人公兼具众多历史人物特征,并将哈姆雷特与堂吉珂德的典型形象东移,人物塑造抓人眼球。常虹作为该小说的插画师,从文字视觉化角度谈到了其插画创作的创作过程以及对小说的感受。他表示,整部作品通过文字传递出极强的视觉感受,具有很好的影视剧改编潜质,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得以创作出书中的插画画作。周安华认为,小说展现出一个超越主流态度的更深刻的主流,进入到哲学层面,即宿命、隐晦和人的终极化阶段,具有当代文人创作小说的大格局和大眼界。小说中不断

叠化和不断聚焦的时空给予了空间自由建构的可能,同时赋予受众更多想象空间,其非线性但极其精妙的情节铺设使作品具有极强的影视化价值。卢炜对王霄夫以往作品进行对比分析指出,作者从过往常用的一分为二的观点转向了“一分为三”,即时空转换的三重维度,出现了中间变量。这种中间变量,使小说在以人为本意识的基础上拓展了思维深度,实现了精英化写作。高小立说,作品通过人物的名字、性格、面貌、表情等细腻刻画,拓展了有关爱恨情仇不同面向的情感丰富维度,使人物形象在读者脑海中不断被塑造,能够形成影视剧中的可被呈现的形象。而书中梦境与现实交替的蒙太奇、符号化的人物姓名和时空交错错位的叙事方式,又使其极具象征意义。夏烈认为,小说内容上实现了文明与革命的结合,笔法上实现了传奇化与文学性的融合,结构中蕴藏着民间形式的书写。而这一切在作者笔下又被转化为精英化文本,带有作者浓郁的个人气质风格,是一部叙事题材独特的IP作品。陈奇佳分析,《六尺之孤》最大的特点之一一是情节线索复杂交织,如一张细网,牵一发而动全身,但又相互照应、彼此衬托,有机地推动叙事主线往前发展,决不零乱,让人感到一种小说情节内在结构上的妙处。徐洲赤认为,从影视化改编的角度来看,小说中密集的动作性场景使其具备强烈的画面感,已初具影视化特征。林玮结合王霄夫过往作品,提出了“公子叙事”的观点。文明与革命的关系向来是文艺界讨论的重要话题,他认为小说中创造的公子形象代表着中国式现代性的生存,这为该题材小说提供了文明史上的合法性。范志忠谈到,小说不论是时间的选取还是故事的背景,均被放置于时序即将被颠覆的语境下,并重构了一个新世界的框架进行探讨,同时正义与伦理错位的融合使小说具备了一种独特的文本张力。

《六尺之孤》作者王霄夫谈到,“创作来源于生活是一个永恒的真理”,一个故事的氛围等于创造一个世界,而这种创造故事世界的能力正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谈到影视化改编的问题,他认为还需要在去精英化、去寓言化上作出一定的努力。

(浙 闻)

中国书协“美丽中国”主题创作书法展线上开展

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在中国文联指导下,中国书协策划举办的主题创作书法系列展“美丽中国”篇于6月2日在线上开展。展览分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七个板块,从崇山峻岭到峡谷平湖,从茂林修竹到肥田沃地,收集26个生态文明治理案例和相关的古今诗文,从小见大的视角、亘古通今的脉络,徐徐展开源远流长、永不褪色的美丽中国画卷,同时展现一代代中国人在历史长河中,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为建设美丽中国所付出的辛勤汗水和不解努力。

为了更好地以书法形式讴歌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展示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中国书协遴选出来自代表性

地域的基层一线骨干书家开展主题创作,并于同期举办“创作中的细节”主题性创作系列座谈会。广大书家在深入人民、扎根生活的创作实践中,深刻领悟到要在扎根生活、关注社会中书写时代,在秉持书法专业性的基础上,追求书法艺术人民性和时代性。

参与创作的书法家在座谈会中谈到,此次主题创作的创作实际上也是“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过程,将生态文明治理案例与古今诗文有机结合,感受古典诗词与新时代的共生关系,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土又面向世界的中华文化与艺术魅力传播出去,为日后的书法创作开阔视野、升华境界。

(书 讯)



2022年历史剧《风起陇西》在中央八套首播,随后在爱奇艺热播。该剧收视的起起伏伏,又一次证明了改编四大名著风险与光环的并存。千百年来,对于这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讲述历经几生几世:从口头文学—话本—文学经典—影视,不断翻新。这世上的故事总数有限,讲法却可以不断翻新。《风起陇西》原著小说作者马伯庸选取的是《三国演义》的结尾处,三国开国阶段大体完成,是诸葛亮写出《出师表》、力主北伐的时段。剧情从第一次北伐失败开始,到第二次北伐结束,改编为24集,剧情紧凑跌宕,围绕蜀汉情报机构司闻曹如何抓出内奸,及其背后的权贵党争等情节展开。其历史时段与党争背景实有其事,其他部分从机构设置到人物情节皆是虚构。

尽管纯属虚构,《风起陇西》还是带着正剧与正史范儿。通过近20年的影视改编观察可以看出:尽管文学经典的衍生无穷无尽,但当代对于《三国演义》文本的戏仿、翻拍、颠覆等游戏式的言说欲望,要弱于《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也许是因为《三国演义》本质上讲的是朝堂与战场,不像《水浒传》离草根和民生那么近,也不像《红楼梦》讲的是细腻缠绵的感情之“罗曼司”,《西游记》离神怪近,属于西方所说的“罗曼司”,人们对于托生于正史的《三国演义》多了一份郑重与敬畏,敢于远观,不敢妄玩。今天的观众既迷恋历史叙事,又时不时指责影视剧架空历史、“消费历史”,原因也在观众看剧时的情感期待本就是复杂的,既希望得到共情和提升,又厌烦迎合与狎昵。所以这里可供讨论和提升的空间便包括故事改编与创新的深度与角度等问题。

1 以类型论剧作,也许在固定题材、形式、语言等范畴有效,但却无法尽数创作者如何在情节演进中施展变化。“故事是生活的隐喻”,故事的讲法总是受生活中形成的观看需求与表达意愿牵引,一次次被改写与刷新。《风起陇西》应归置于谍战与历史的类型融合交叉地带。进一步说,武侠与间谍的身份接近甚至重合,并非在叙事中,而是实有其事,在《史